

# 《地理学报》80年载文分析

王 铮, 朱艳硕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190)

**摘要:** 本文回顾并且评述了过去80年《地理学报》的载文历史, 发现它刻画了中国地理学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即: 1934-1948年的艰难探索的近现代地理学的形成阶段, 1949-1966年的地理学发展中的科学化 and 应用化兴起阶段, 1978-2000年的地理学繁荣的百花齐放阶段, 2000年后的地理学自主创新突出的大发展阶段。《地理学报》当前的载文反映, 中国地理学日益国际化, 今后的发展是不仅需要融入世界地理学的发展, 而且应该成为具有中国文化引导国际地理学发展的期刊。

**关键词:** 地理学报; 科学史; 中国

DOI: 10.11821/dlxb201408004

《地理学报》由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地理学科最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刊物, 主要刊登能反映地理学最高学术水平、最新重大研究成果, 地理学与相邻学科的综合研究进展、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前沿理论以及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并有较大应用价值的地理科学论文。一般认为, 这些文章能及时反映地理界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技术和地理学科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如资源开发与分析、环境保护与利用、经济布局研究、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可持续发展对策以及文化地理、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等方面, 为地理科学工作者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开拓知识, 进行创造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地理学报》于1934年, 由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谢家荣等人创办(李旭旦, 1984), 迄今已编辑发行整整80年, 是中国创办时间最早, 出版时间最长的科技期刊之一。《地理学报》的发展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 1934-1948年、1949-1960年、1961-1966年、1978-2005年、2006年至今, 其中, 1949-1966年又可以视为一个阶段。伴随着《地理学报》发展, 可以看到中国地理学乃至中国科学的成长。

## 1 第一阶段: 近现代地理学的形成

自1934年9月创刊至1948年, 《地理学报》共计出版15卷22期, 刊登论文、调查报告、书评和专著等达百余篇。所刊论文均有英文提要, 同国外各地理学会广泛交换, 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地理学报》从1934年发行以后, 第一年出版两期, 1935年、1936年各出四期, 1937年由于爆发日本侵华战争, 地理学报的约稿、编辑、以及印刷出版受到影响, 不得不从季刊改为年刊, 每年出一期(1937-1944年), 抗战胜利后的一年半间(1945年后期-1946年), 又只出了一期。随后的三年内战, 《地理学报》又间以两期或三期合刊的方式, 勉强维持两年(1947-1948年), 最终迫不得已, 停刊1年(1949年)。

《地理学报》创刊初期, 竺可桢先生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气候和地理学的文章, 如: 《东南季风与中国雨量》(1934)、《中国气候之要素》(1935)等, 胡焕庸先生《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一文中提出了划分中国人口地域分布的“胡焕庸线”, 并在《中国之农业区域》(1936)首次提出中国农业地理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奠定了中

收稿日期: 2014-04-23; 修订日期: 2014-07-28

作者简介: 王铮(1954-), 汉, 云南陆良人, 研究员,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3918M), 主要从事理论地理学、计算地理学和区域科学与管理研究。E-mail: wangzheng@mail.casipm.ac.cn; wangzheng@casipm.ac.cn

国科学地理学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印堂先生1934年发表的《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性》,明确提出,中国人多地少,因此“垦荒是治标,节育才是治本”,换言之是《地理学报》第一个发表了中国需要计划生育的科学论证。习惯说其他人首次提出中国需要计划生育,是一种历史误会。在这个历史时期,地质学者给《地理学报》写出很多有关地理学的文章(胡焕庸,1984),反映了当年发展地质学与地理学的紧密结合。由于中国缺少地质学传统而地理学传统强烈,来自西方地质学容易在中国取得知识分子认同,《地理学报》文章表明,现代中国地理学是借助地质学的渗入而发展起来。

抗战时期,中国地理学家结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大量扩展区域考察。所以当时《地理学报》文章以刊登小区域研究和路线考察报告居多(郭杨,1984)。例如1940年李旭旦、任美镠等参加的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北考察团,队员只有4人,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考察范围也仅限于川西北及甘南白龙江流域一隅。徐近之对西藏的考察、严钦尚对西康的考察都结合了战争的需要。其时,陈宗器的《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地理学报,1936)、严钦尚的《西康居住地理》(地理学报,1939)、陈述彭的《遵义附近之聚落》(地理学报,1943)、杨怀仁的《贵州中部之地形发育》(地理学报,1944)等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抗战胜利以后,1947年翁文灏在《地理学报》第14卷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东南部进一步的建设》一文,标志着中国地理学发展开始结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不再是纯经院学问。这时,《地理学报》刊出了一些土地利用、城市地理等颇有建设参考价值的论文,如:程璐、陈述彭等的《云南滇池之土地利用》、杨利普的《岷江峡谷之土地利用》、《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文振明的《曲江都市地理》等,开始了向“建设地理学”的转变。吴传钧、施雅风(1999)认为,1934-1948年这段时期《地理学报》的出版虽历经波折,但所刊文章均代表了当时中国地理学的最高研究水平。

## 2 第二阶段:地理学的科学化和应用化兴起

虽然二战后“建设地理学”已经在中国兴起,但是地理学作为一种为生产建设服务的科学的发展出现在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经过1949年的战乱冲击,《地理学报》在1950年复刊。此后至1966年这段时期《地理学报》成为承载中国地理学术论文发表的主要刊物,共刊出17卷、54期,载文355篇,成为当时地理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图1)。最初,因为政治大转变,《地理学报》从每年出2期(1950)到每年出1期(1951、1952),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1959年的6年间,每年4期、定时出版。并且在1959年这一年又增刊2期,这是自《地理学报》创刊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形成了中国地理学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

1950年的中国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全面接受苏联地理学的转变。1952-1960年间,地理学报刊载了30余篇译文,均为介绍苏联地理学概况,包括理论、方法和学术争论中的问题,系统地引入了苏联的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如:Д.П.阿甫孟特的《转变中的苏联地理学》(1953),N.B.萨莫依洛夫的《海岸及河口的现代研究方法》(1956)、J.F.盖勒特的《新观点下的夷平面—梯极山地—单斜地》(1960)等。应该承认,这些苏联学派的文章对中国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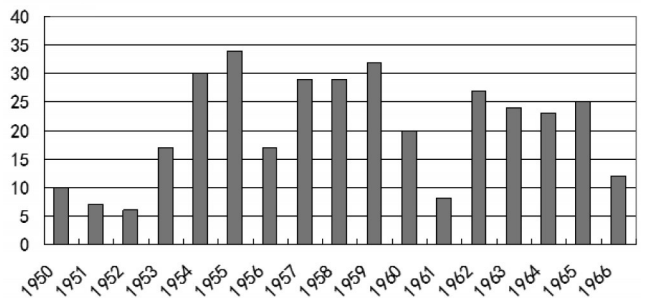


图1 1950-1966年《地理学报》年载文量变化趋势

Fig. 1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papers 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during 1950-1966

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但是由于片面强调“学习斯大林的地理科学思想”,人文地理学却受到了抛弃。1956年《地理学报》撰文《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人文地理学》,宣布“人文地理学,是属于这种(彻头彻尾的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伪科学的思想体系”。在1956年,“人地关系论”“区位论”都遭到批判,例如胡焕庸因为“运用资源/人口公式”,提倡“节育优生”受到点名批判。接着,人文地理学除经济地理学以外,全面衰退。而经济地理学,由于抛弃了区位论等理论,成为了一门规划性科学。当时,所谓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仿效苏联的哲学化风气,致力于讨论经济地理学的“任务”、“对象”、“性质”,开始了中国地理学以哲学代替科学的风气,破坏了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发展。这时,苏联关于经济地理的两大学派的争论传到了中国,一派主张经济地理研究对象是生产配置,另一派巴朗斯基主张的经济地理研究对象是经济区域。在由于地理学的实证科学传统,巴朗斯基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了推崇,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国实际上接受了具有规范科学色彩的“生产配置”学派观。如卡尔娜乌荷娃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配置原则》(1953)。不过,在施雅风1953年发表了《沙伊奇科夫博士论地理学上的几个基本问题》,实际上肯定了两学派共存的权利。由此,也为中国地理学重视宏观问题的新方向和重视区域那么微观经济现象的西方传统留下了结合的机会。

这一阶段中国地理学学习苏联的经验,在结合经济建设需要,在区划理论和地貌学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1958年,黄秉维发表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的初步草案》是中国在自然地理学系统、科学研究的代表作,文章不仅完成了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而且还展开了区划方法学讨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1959年陈吉余、虞志英、恽才兴在《地理学报》发表的《长江三角洲地貌发育》则是地理学基础研究的代表作。至1960年,竺可桢在《地理学报》的发表文章总结,中国的河流地貌学、工程地貌学、冰川学、河口海岸地貌学、沙漠学、农业地貌学研究,都取得了明显进步。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地理学和当时的西方地理学几乎隔绝,人文地理学在其科学性受到怀疑,城市、人口、文化地理研究发生了停滞。“区划”成为了这一时期最热门的议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到1961年,《地理学报》发表了研究“区划”的文章达到35篇,内容涉及自然区划、经济区划诸多方面。其中,罗开富1955年发表于《地理学报》的《再论自然区划问题》、任美锷和杨纫章1961年发表于《地理学报》的《中国自然区划问题》,分别是这个问题的开山之作和阶段性总结,几乎所有成名的地理学家都就区划问题在《地理学报》发表了论文。而1949年前,《地理学报》仅仅发表过两篇题为区划问题的文章,即任乃强1936年发表的《四川省之自然区划与天产配布》和前述胡焕庸的文章。

然而,中苏政治上公开论战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地理学向苏联膜拜的趋势发生了变化。1960年,黄秉维发表《地理学的一些主要趋势》,提出地理学存在4个趋势,实际上是变革的信号。黄秉维认为,第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掌握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所已经证明的规律,根据它们来观察自然地理学的对象,研究这些对象的发生、发展和地域分异,从而健全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基础。第二个新趋势是综合研究,研究各对象之间总的联系,研究一个对象与其周围诸现象之间的联系。此类研究包括现代过程的研究、历史因素的研究及其进一步发展的研究。第三个新趋势是吸收数学、物理学、化学的知识来建立观测、分析、实验的技术,其中有许多是在其他自然历史科学中业已建立的技术。第四个新趋势是以前述理论和方法为依据,研究和预测自然过程的方向、速度和范围,指出利用与改造自然最有效的途径。最后一个方面是运用航空照片判读和航空观测的方法来加速考察工作的进度和精确程度(载《地理学报》1960,26卷第3期)。此文在承认了苏联地理学引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所已经证明的规律”来阐明自然地理学规律的同时,又开始强调“综合研究”,特别是强调研究包括现代过程的研究、历史因素的研究,这是与国际上当时“要历史地理解地理学”的人文地理观点一致的。文章列举的“吸收数学、物理学、化学的知识来建立观测、分析、实验的技术”,已经与当时国际地理学的“计量革



命”思想趋同,并且预见到了遥感的应用。除了《地理学报》,整个地理界的变革已经开始,例如1961年严钦尚在中国地理学会年会提《我国地貌学研究若干观点的讨论》,提出地貌学研究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乃步国际计量革命的后尘。杨吾扬1963年在《地理学报》发表了《关于产销区划的一些原理、方法的介绍和体会》构筑了一个定量的区界测定模型,这是一个运筹学基础的模型。1966年数学家陈锡康在《地理学报》就产销区划的一些原理和数量方法的进一步探讨。这表明中国地理学正在独立成长起来。

郭杨(1984)认为,从1961年开始,《地理学报》介绍欧美地理学进展,组织开展了区划体系、原则和方法的讨论,但多数仍限于自然地理和农业地理方面。实际上,我们统计,此期《地理学报》介绍欧美地理学进展仍然非常少,与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地理学的介绍相比,仅仅是凤毛麟角。能够查到的仅有王乃樑的《法国地貌学现状》。王乃樑的论文是一篇标志性的论文,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地貌学新观念、新方法,对动力地貌学的体系做了系统介绍,与严钦尚的地貌学研究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相辉映,符合当时国际地貌学研究潮流。这一时期,《地理学报》的文章还出现了国际视角,例如张丕远、陈恩久的《北太平洋地区海面水温与气温的一些特征》,研究范围已经突破了新疆疆域。

1961年后,随着大跃进结束和对苏联体系的关系淡化,《地理学报》发表了一些对前一阶段研究总结性的系统论述文章,它们标志着中国地理学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地位。例如,左大康和弓冉1962年发表的《中国太阳直接辐射、散射辐射和太阳总辐射的关系》、汪安球《欧亚大陆荒漠草原棕钙土地带的自然条件与土壤形成》、许世远《中国天山现代冰川作用研究》、施雅风和谢自楚《中国现代冰川的基本特征》、刘昌明和钟骏襄《黄土高原森林对年径流影响的初步分析》、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傅抱璞《起伏地形中的小气候特点》、段月薇《近八十年来北半球冬夏温度的变化与振动》、陈静生《华北平原的景观及其地球化学特性》、尹学夏《弯曲性河流形成原因及造床现象初步研究》、严重敏和刘君德等的《试论苏锡地区农业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关系》等都标志着理性认识的深入和学科的科学进展。1963年杨吾扬和邓静中分别在《地理学报》发表《关于产销区划的一些原理、方法的介绍和体会》、《中国农业现代区划的初步探讨》,揭开了全国性经济区划的序幕。遗憾的是,这种独立发展的学科主要表现在自然地理学领域,在人文地理领域,《地理学报》的文章反映,中国地理学还是缺少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探究。

1966年《地理学报》停刊,这是全国出版业普遍性的问题(现在还是很不清楚中国整个文化出版停止的背景),《地理学报》当然不能例外。不过1972年在首先恢复了《地理知识》(现《中国国家地理》)的出版,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 3 第三阶段:地理学的百花齐放(1978-2000年)

《地理学报》于1978年秋重新复刊截至2000年出版242期,载文1868篇,这是一个地理学复兴到百花齐放的时期。伴随这地理学的百花齐放,《地理学报》从1979年的季刊发展到1992年的双月刊,到2006年改为月刊。

1978年,《地理学报》复刊。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地理学带来极强的生命力,地理学研究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土地迅速地表现出来。复刊的《地理学报》进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1978年,《地理学报》共出版2期,目录如下:

1978第1期:钱宁、张仁、赵业安、刘月兰,从黄河下游的河床演变规律来看河道治理中的调水调沙问题;施雅风、张祥松,喀喇昆仑山巴托拉冰川的近代进退历史变化;顾震潮,我国雷暴的气候特点;耿大定、陈传康、杨吾扬、江美球,论中国公路自然区划;李文彦,煤矿城市的工业发展与城市规划问题。

1978年第2期:张荣祖,试论中国陆栖脊椎动物地理特征——以哺乳动物为主;高国栋、陆渝蓉、李怀瑾,我国最大可能蒸发量的计算和分布;刘昌明、钟骏襄,黄土高原森林对年径流影响的初步分析;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长江模型实验小组,长江中下游分汊河道演变的实验研究;李文漪、吴细芳,云南中部晚第三纪和早第四纪的孢粉组合及其在古地理学上的意义;谢贤群,鲍士柱,海拉尔东部开垦地与草场地表热量平衡及其对尘埃输送的影响。

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这时地理学研究较文化大革命前出现多元化,研究内容遍及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学、生物地理学、环境演变,特别是经济地理学。必须指出的是,施雅风和张祥松的《喀喇昆仑山巴托拉冰川的近代进退历史变化》、李文漪和吴细芳的《云南中部晚第三纪和早第四纪的孢粉组合及其在古地理学上的意义》2篇文章是今天特别热门的“全球变化”研究的起始性文章,李文彦的《煤矿城市的工业发展与城市规划问题》首次提到“城市规划”问题,“城市规划”成为地理学的一种主要的战场。特别是此文明确地把“产业发展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在中国地理学后来的发展中,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传统。纵观1978年的全部文章,可以分析,这些文章的科学性、理论性、自主创新性较“文化大革命”前明显地提高了,这是文化革命中地理学家在种种困境下坚持研究,厚积薄发的结果。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大庆年,地理工作者对30年来中国地理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主要集中在综合自然地理学、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学、沙漠学、环境科学(所谓化学地理学)、环境演变等自然地理学科,《地理学报》也组织刊出前一阶段我国对青藏高原大规模科学考察的成果,其中郑度、张荣祖、杨勤业的《试论青藏高原的自然地带》,章中的《珠穆朗玛峰高海拔地区冰雪中的微量元素》,王家澄、王绍令、邱国庆的《青藏公路沿线的多年冻土》以及汤懋苍、沈志宝、陈有虞的《高原季风的平均气候特征》、林振耀和吴祥定的《北美塘东部暖季(6-8月)气候特征的初步探讨》,后来都成为中国青藏高原研究的经典文献。这一年还刊出了崔启武、孙延俊的《论水热平衡联系方程》和黄永砥的《简易三通道彩色合成仪》标志着理论地理学和地理技术的也取得了进展。这一年刊出的张丕远、龚高法的《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和陆大道的《工业区的工业企业成组布局类型及其技术经济效果》,由于回答了相关领域的主要问题,后来成为了相关学科高引用率的文章。

1982年《地理学报》发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地理学报编委笔谈》,反映了地理学国土研究的热情,讨论了基本科学问题,推动了20世纪80-90年代国土整治与规划研究,1983年《地理学报》发表程璐的《我国的国土规划问题》,阐述了国土规划的地理学基本观点,强调“经济区划是国土规划的基础”,使得国土规划与地理学长期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区划”成果接轨;此文还强调国土规划应有“地域观点”、“综合观点”、“比较观点”和“注意不破坏生态平衡”,奠定国土整治与规划的基本原则。可惜本文没有强调结合自然区划,也缺少产业结构分析,未能形成完整的方法学。此后“国土整治与规划”如雨后春笋,至1994年,《地理学报》一共发表17篇这方面的文章,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为中国这一阶段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1994年中国政府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后,在《地理学报》上出现2篇重要文章,章申等的《持续发展与地理学》、陆大道的《经济地理学与持续发展研究》,中国的国土整治与规划研究迅速地可为可持续发展研究代替。这一方面反映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积极性,另方面也折射出中国地理学缺少理论创新,科学研究容易为政治经济战略所改变的弱点。关于这个特点,本文不予评论。

在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研究热点是三角洲研究,《地理学报》1980-2000年间,发表了40篇关于三角洲研究的文章。这里文章大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三角洲发育与环境的文章,第二类是关于三角洲土地利用的文章,第三类是关于三角洲产业与城市发展的文章。三角洲热的兴起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沿海地区,许多环境、经济、人口

问题涌现了出来，让地理学家大显身手。这一趋势反映了我国地理学研究完全脱离了旧地理学的经院气息，研究向深层次发展。

环境演变也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研究热点，1990-2000年间，《地理学报》共发表环境演变(变化)论文19篇，对第四纪环境演变有了清楚认识。这方面的研究完全代替了自然地理学家过去对自然区划的关注，并且与国际相关研究实现了接轨。

1949年后，一度消失的城市、人口地理研究成果在1980-2000年间喷发式地在《地理学报》发展，形成了人文地理分支的狭义城市地理学，以城市气候为代表城市自然地理学，其中关于热岛效应的研究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当年被斥为“伪科学”的人文地理学在《地理学报》上复兴，期间以“人文地理学”为关键词的文章共发表18篇，这些文章大多做一般性讨论。普通人文地理学科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城市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中。以“人地关系”为关键词的文章共12篇，为人文地理学论恢复了名誉。除此之外，关于中国庐山冰川、黄土高原冰期气候特点、中国自然带界限等，发生了众多的争议。这一时期还发表了许多定量的理论地理学文章，牛文元关于自然地理界限模型的文章和杨吾扬关于区位论的文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值得提出的是，1987年，陆大道在《地理学报》发表《我国区域开发的宏观战略》，首次提出中国的点轴开发模式，打破了中国过去地域生产综合体组织区域发展模式的计划经济框架，为中国宏观经济意义上的区域发展开拓了市场经济路线，《我国区域开发的宏观战略》标志着中国地理学苏联模式的终极，虽然苏联模式已经为“城市地理学”研究、“三角洲”研究所动摇。”城市”、“三角洲”作为地理学研究模式动摇的是过去以部门地理分离的研究模式，其意义是学术的，而“点轴理论”动摇的是学科思想。

令人不解的是，“八五”期间(1991-1995年)中国地理科学开展了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研究和南方山地的研究，但是1980-2000年间《地理学报》仅仅发表了4篇关于黄淮海平原研究的科学论文，关于南方山地，未能检索到一篇。

此期地理信息科学兴起，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研究的文章大量涌现，但是基本上是应用性的文章。这两件事情可能折射出中国地理学不重视理论总结的问题，这种情况显得比追随苏联模式还糟糕。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地理学在1980-2000年期间，百花齐放，但是中国不重视理论提升的旧的学术传统在苏联模式退潮后有些卷土重来。

由于稿源丰富，篇幅有限，从1994年至2004年，《地理学报》共有9期增刊出版，内容主要集中在自然地理和地理信息系统，人文地理的载文比重则相对较低，直到2004年才出版独立专辑(表1)。总之，从《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中，能充分地反映出这段时期中国地理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努力奋进以及地理科学取得的实用进展。

4 第四阶段：地理学的大发展(2001年至今)

2000年，中国加入了WTO，地理学发展呈现出繁荣性，至2006年《地理学报》开始以每月一期的形式出版，每期刊文均超过10篇，到2011年共载文582篇，期刊年出版页面由1978年的176页增加到2011年的1728页，增加了近9.8倍。从2006年到2011年《地理学报》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逐年增加，在所有地理学期刊中位列第一，表明其学术影响力、刊登文章的学术价值与可信度受到地理学界的普遍认可。

2000年后中国地理学的一个特点是国际化，这种研究倾向在《地理学报》上有明显

表1 1994-2004年《地理学报》增刊类别及论文数量

Tab. 1 Subjects of supplements and the number of papers 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during 1994-2004

年份	增刊类型	载文数量	卷号
1994	综合专辑	20	49
1995	地理信息专辑	16	50
1996	综合专辑	19	51
1997	综合专辑	21	52
1998	综合专辑	28	53
1999	综合专辑	21	54
2000	气候专辑	25	55
2003	气候专辑	17	58



的反映。实际上《地理学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际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论文写作规范国际化,视野开展,过去那种罗列参考文献不清、论文缺少研究进展评述的现象消失了;论文引用国际文献增多、国际视野也拓广了,而且出现上述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论文,如研究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国际化的表现的第二方面是研究领域与国际研究同步或者说紧跟,或者说关心国际共同关心问题。2000年后,全球变化与环境演变、土地利用的研究成为了《地理学报》的基本主题,以至于后来开设了“全球变化·环境变化”、“土地利用”的固定栏目。国际化第三方面是地理信息科学的普遍化,绝大多数论文使用GIS方法和一般的计量地理方法,而这些方法是国际的主流。

在注意的是,在研究主题方面的国际化,20世纪那种中国政府强调的主题成为最大热点的现象不再出现,例如从1982年强调“国土”研究,从1983年4月北京学者杨树珍在《地理学报》发表《国土整治与经济区划》,到1985年3年在《地理学报》共有5篇文章选择“国土”为主题词,此后有大量文章以国土整治为主题词。但是2007提出“主体功能区”概念,2007年4月北京樊杰学者发表《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后,到2009年只有4篇文章选择“主体功能区”作为主题词,2010-2013年不再有使用“主体功能区”为主题词的文章。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国与国际研究同步,但是注意到中国是个大国,有许多本国问题,对本国特定地理问题需要及时解决。

值得庆贺的是,《地理学报》在反映研究走向国际化的同时,出现反映探索地理学的普适理论而不是局限于中国问题的论文。例如陆大道的《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系统地阐述了由它本人创立的区域开发“点轴理论”。这个理论打破了中国地理学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色彩的区划规划模式,强调由市场引导的城市节点和交通网络联系的开发模式,是区域开发理论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在地理学理论研究方面,王铮和毛可晶等2005年发表在《地理学报》的《高技术产业聚集区形成的区位因子分析》、宋周莺和刘卫东2005年发表在《地理学报》的《信息时代的企业区位研究》,研究了新产业的区位理论。这些文章研究的理论成果,都或多或少具有全球普适性意义。特别是陆大道提出的“点轴理论”,不仅被用于指导中国的区域开发,而且被用于指导国外的开发,这方面在《地理学报》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如龚胜生、周军、张涛的《湖北省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与空间意象》和吴森、杨兆萍、张小云《点—轴理论在新疆与西西伯利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应用》。最后这篇文章出现在《地理学报》2010年第65卷第8期,它的意义在于中国地理学用自己的理论走向了世界。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立足中国需要、放眼世界问题”的研究是中国特有的“新经济地理学”思潮。

在方法学研究方面,计算地理学或称地理计算的兴起是2010年左右出现的热潮。查《地理学报》创刊以来到2013年底,共发表105篇题目含“模拟”的论文,其中最初的论文是1988年边海、铁学熙发表的《天津市夜间城市热岛的数值模拟》,这是一篇介于地理学与气象学之间的文章。关于“模拟”的文章,平均每年4.2篇,至2013年则发表10篇,内容涉及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诸多领域。另外题目含有“计算”一词(不包括仅仅使用“计算机”一词的)的共48篇,以2010年最多,达4篇。这些以计算模拟为核心的定量分析方法完全替代了传统的以统计为主要方法的数量地理研究,是国际地理学研究的一条亮丽的风景线。中国这些研究从气候、地貌研究到城市地理、旅游规划领域,标志着地理计算的普及。正如王铮(2011)所认识到的,地理计算为核心的计算地理学不仅是地理学研究工具的开拓,而且是发展了理论地理学。例如岳天祥和叶庆华的《景观连通性模型及其应用》、刘小平和黎夏等的《基于多智能体的居住区位空间选择模型》、吴静和王铮的《2000年来中国人口地理演变的Agent模拟分析》分别发展了地方连通性理论、居住区区位理论和气候变化下的人地关系理论。总之,地理计算或者计算地理学将成为一段时期的研究主流之一。在这些论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新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国际刊物上,成为国

际重视的文章。《地理学报》这种在地理计算方面的方法学进展, 对国际产生了影响。

## 5 结语

到2014年, 《地理学报》已经经历了80年的发展, 它在中国地理学乃至中国科学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 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科学, 从引进、到模仿苏联再独立成长, 最终融入世界科学主体的过程, 这是近现代发展的一个历史, 也是中国振兴、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必然过程。

回顾《地理学报》历史, 发现它刻画了中国地理学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即: 1934-1948年的艰难产业的近现代地理学的形成阶段, 1949-1966年的发展中的地理学的科学化和应用化兴起阶段, 1978-2000年的地理学繁荣的百花齐放阶段, 2001年后的地理学自主大发展阶段。《地理学报》反映, 当前中国地理学正在国际化, 今后的发展是不仅需要融入世界地理学的发展, 而且应该成为具有中国文化能够引导国际地理学发展的期刊。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Li Shutan. Weng Wenhao's contribution to the founding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in China (In memory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4, 39(3): 244-251. [李旭旦. 翁文灏先生对我国地理学的贡献: 为纪念《地理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 地理学报, 1984, 39(3): 244-251.]
- [2] Hu Huanyo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4, 39(3): 231-233. [胡焕庸. 欢庆《地理学报》创刊50周年: 回忆学会早期历史. 地理学报, 1984, 39(3): 231-233.]
- [3] Guo Yang. Fifty years of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4, 39(3): 234-239. [郭扬. 五十年来的《地理学报》. 地理学报, 1984, 39(3): 234-239.]
- [4] Wu Chuanjun, Shi Yafeng. Memoirist of Chinese Geography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90 Years. Beijing: Academy Press, 1999. [吴传钧, 施雅风. 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 [5] Wang Zhe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ational geography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heoretical geograph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26(4): 423-429. [王铮. 计算地理学的发展及其理论地理学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1, 26(4): 423-429.]

# An investigation to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over the past 80 years

WANG Zheng, ZHU Yanshuo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comments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by papers over the past 80 years. In the article, we find that Chinese geography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period 1934-1948, the rise from exploration of modern geography in a hard time; the period 1949-1966, Chinese geography underwent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process; from 1978 to 2000, Chinese geography put itself into the flourishing stage by closely serv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since 2000, China has focused on geographical innovation, and tends to be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papers 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we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should be not only integrat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geography, but also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and become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pioneers.

**Key word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history of science; China